

四川客家文化研究丛书

刘义章
陈世松 主编

成都东山客家研究

上

成都沙河客家的变迁

谢桃坊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天地出版社

成都东山客家研究 上

成都沙河客家的变迁

谢桃坊·著

四川出版集团

 天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都东山客家研究(上下)/刘义章 陈世松主编
著. -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05.10

ISBN 7-80726-146-3

I. 成... II. 刘... 陈 III. 客家-民族文化
-研究-成都市 IV. ①K281.1-53 ②D442.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5365 号

成都东山客家研究(上下)

主编: 刘义章 陈世松

责任编辑 刘峻山
特约编辑 侯矾楠 马 薇
封面设计 冯永革
版式设计 古 蓉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盐道街3号 邮政编码 610012)

网 址□ <http://www.tdph.net>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版 次□ 2005年10月第一版
2005年10月第一次印刷

规 格□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25.125

字 数□ 560千

定 价□ 38.00元(上: 16.00元 下: 22.00元)

书 号□ ISBN 7-80726-146-3/K·05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8) 86666810 (市场营销部) 86715665 (总编室)

题 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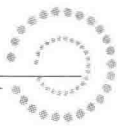
沙河自古绕成都，沃野风烟景色殊。
水碾筒车供史话，沧桑几度绘新图。

五千里路到西川，走近沙河种坝田。
创业艰辛成往事，祖宗话语已茫然。

勤苦农耕事已休，竹篱茅舍变高楼。
殷殷红豆根犹在，闲对儿孙说循州。

序

刘义章 陈世松



成都“东山”客家这一概念，最先出现在1941年成都出版的《文史教学月刊》第3期上，是由钟禄元先生（1913~1988年）在该期发表的一篇题为《蜀北客族风光》的文章中提出来的。在该文中，钟禄元第一次向外界报道了成都近郊的客家人的“奇风异俗”。



序

半个多世纪后的1999年，刚刚成立的四川客家研究中心为了开创四川客家研究的新局面，决定发起开展“成都东山客家历史与现状”课题研究。过了两年，在2001年3月成都举行的以“四川与客家世界”为主题的“第七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上，正式公布了这一课题的最初成果，这就是由我们署名主编的“四川客家文化研究丛书”系列的三本书：《成都东山客家氏族志》、《四川客家历史与现状调查》、《四川客家民俗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

严格说来，这批成果还仅仅是对四川部分客家地区，尤其是成都东山客家方言区的分布及其现状所作的一次初步摸底，由于时间紧迫，当时还来不及、也不可能对东山

客家的内部结构及其与闽粤赣客家的比较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因此，这批成果无论在深度、广度上都还有待开掘。虽然如此，它们的意义和价值也不容低估。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有关四川客家研究的成果，大多引用这次调查的结论、使用这次调查中所搜集的资料。可见这次调查从某种意义上讲，揭开了全面研究四川客家文化的序幕，奠定了日后深入研究的基础。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成都东山客家研究”，作为“四川客家文化研究丛书”系列第二批研究成果，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谢桃坊著《成都沙河客家的变迁》；另一部分是钟培全、冯敏著《成都东山客家太平村》。这是继上一次调查之后，由四川客家研究中心在近年来发起组织的两个集体科研项目的结晶。如果把第一批成果看作是面上田野调查的收获，本批成果则是对成都东山客家方言区一条线（沙河）和一个点（太平村）的文化积淀作出深入探讨和解剖。

对于这两本书的缘起背景、特点与价值，需要向读者作如下的交代：

一、关于《成都沙河客家的变迁》的产生，可以追溯到2002年初。当时成都市正计划着手打造继府南河（今已更名为锦江）之后的第二张“城市名片”——沙河整治工程。沙河整治工程是成都市政建设的又一大手笔，它吸引了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的关注，人人争相建言献策。本书主编之一陈世松，在研究沙河历史沿革与客家人在沙河所经历的巨大变迁的基础之后，及时撰写了《沙河与客家文化》一文。文中提出了如下一些论断：沙河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交相碰撞的地带；沙河是东山客家的生命河；沙河是东山客家的分界河；沙河是客家文化的风景线；沙河

整治不应忘记客家文化（《成都日报》2002年1月16日）。为了引起政府对沙河客家文化的关注，四川客家研究中心接着组织有关专家联合署名，撰写了《关于在沙河中段构建“客家生态文化园区”的建议》（《四川客家通讯》2002年1期）。此建议后来得到政府的正式采纳，成都市同意在沙河中段以“主题公园”的形式，构建一项名为“沙河客家”的景点。据了解，这一景点目前已经竣工。

受此鼓舞，四川客家研究中心决定以科研课题的形式，进一步推进对沙河客家文化的研究与开掘。于是，2002年6月，经由陈世松牵头设计、一个向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申请立项的重点科研项目——“成都东郊沙河客家的历史与现状考察”得以批准启动。从那时开始，四川客家研究中心先后组织了数十位专家学者投入沙河的考察与研究之中，并产生了多项阶段研究成果。谢桃坊接受委托，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深入调查，最终完成了《成都沙河客家的变迁》一书的撰写。



序

《成都沙河客家的变迁》一书从内容上讲，向人们揭示了在天府之国腹心之区、一个聚居于大都会城市——成都近郊的客家群体所经历的沧桑变迁。这一群客家人，祖籍大多来自于粤东地区，他们的祖先自清前期辗转迁居于成都东山地区，经过若干代生息繁衍之后，东山浅丘地带的空间日渐容纳不了生存、发展的需要，于是大约在清代后期至民国初年，他们又开始走出东山，继续向西挺进。迄至1949年新中国建国时为止，他们中的一部分家族，已经驻足于沙河两岸。这部分聚居于成都近郊的客家人，与他们的祖先相比较，其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已经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20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掀起经济建设的新高潮，一大批工厂、企业、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东郊一

带拔地而起，落户于沙河两岸。于是，当地的客家人开始遭遇了现代文明所带来的最初冲击。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促进城市大发展，随着城市交通的不断拓展，以及成都城市的向东发展布局，沙河沿线的客家人又面临着被城市化浪潮融合的趋势。一部沙河客家人的历史，就是在西向——东退——再东退的轨迹中交织而成的，它所展示的深刻历史内涵是，客家人在一曲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变奏乐章中的适应与变迁。

《成都沙河客家的变迁》一书的作者谢桃坊先生，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研究员，为四川省文史馆馆员。他是沙河土生土长的客家人，担任四川客家研究中心常务理事以来，热心推进成都东山客家的调查与研究，撰有许多客家研究的文章，其代表作为《成都东山的客家人》一书（巴蜀书社2004年8月）。这次成都沙河课题田野调查的开展，他是名副其实的技术负责人。由于他具有这些先天优势和学术素养，因此在调查中，他不仅能够提出深入研究的思路，而且还亲自走访了生活工作在沙河沿线200多位客家人，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素材，为本书的撰写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今天当我们阅读此书时，倍感亲切，无论从历史到现实，都梳理得条理清晰，叙述得深刻明了。显然，没有谢桃坊先生具有的背景和功力是难以办到的。

谢先生曾多次陪同本书主编之一刘义章到东山考察，他对学术研究求真而又认真的精神，令人印象深刻难忘。现在他以同样的精神为人们重构成都历史沙河客家人文景观，为客家学研究作出贡献之余，也同时让大家重新思考传统与现代的传承关系。

二、关于《成都东山客家太平村》一书的问世，也可以追溯到2002年春。本书主编之一陈世松，在一次与成都

龙泉驿区委宣传部负责人碰面会上，随同而来的科长李芸小姐，向他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本区十陵镇太平村有一个客家人，名叫钟培全，从支部书记岗位上退下来后，热心撰写村史，已经写出了好几万字的稿子，区里新闻已经作了报道，希望客家研究中心派专家去鉴定一下稿子的价值。于是，随后我们通过时任十陵镇副镇长、四川客家研究中心理事谢惠祥，得到了钟培全的这部稿子。

初看这部稿子，令我们惊讶不已。这是一部用铅笔写在横行纸上的手稿，简直就像一本小学生写的作文。一笔一划略显吃力，流露出一种严肃不苟的可敬精神。细披文稿，字里行间跳动着客家人所特有的自强不息的奋斗音符。尽管文稿既不全面也不系统，但这种以客家人记客家事的写作形式，显得特别亲切自然。尤其是浸淫在文稿中那些关于客家生产、生活习俗的记述，皆是其亲历亲为亲见之事，写起来得心应手，细致入微，可以说是发自肺腑，出于心田，这是一般学者所难以用笔杆子写出来的，更不可能是在电脑键盘上击打出来的，因此显得弥足珍贵。



序

不过，这部文稿毕竟仅仅是对一个村落的个人记事而已，如果经过加工整理，很难从学术层面上展示其价值。关键就在于能否有人帮助其驾驭文稿，去粗取精，去芜存真。于是，我们想到了请专家学者介入其中，帮助他整理提高的做法。作为本书主编之一的刘义章，从1990年代在广东梅县作田野调查时，就曾经有过接触原乡人撰写的自传的经历，当时就深感“原乡人的视野”在客家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为此还专门以民俗文化为例作了说明和介绍（详见《客家民俗管窥——一位原乡人的视野》，载台湾大学客家研究中心《客家文化研究通讯》第4期，2001年12月）。因此，如果能够物色到合适的合作者，把客家人视野

中的种种文化事项整理出来，一定可以使这种管窥既不失真，而又充满感染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想起了冯敏女士。冯敏是客家籍学者，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四川客家研究中心理事。她具有长期从事田野调查和作民族志的学养与经验，参与各类课题研究，著述甚多。四川客家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她积极参与四川客家田野调查，2001年根据调查所撰写的《成都市锦江区三圣乡万福村客家人调查》（载《四川客家历史与现状调查》，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版），颇具功力，反响较好。当我们把整理钟培全的手稿交给她重新撰写、整理时，她爽快地应允了。

自此以后，冯敏一直把这一任务放在心上，在本职工作繁重情况下，每每于百忙之中不忘抽出时间，理清线索，拟定提纲，多次深入太平村，作深入的田野调查。经过两年多不懈的努力，深入挖掘，在钟培全提供的写作初稿的基础上，冯敏终于把写作聚焦于成都东山一个普通的客家村落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巨大变化上。经过她编经经纬，精巧构思，终于塑造为一部体例完整的学术著作。于是，原本是一部用铅笔写就的习作，最终变成为一部从电脑中输出的学术文稿。在这里，钟培全个人回忆录似的口语，顿时被转化为严谨的学术文字，而他那本土客家人视角下所发生的一切事物，则被忠实地融化在娓娓叙述之中。

经过整理后的《成都东山客家太平村》，以成都东山客家方言区一个普通的村落为个案，对一般客家村落所应该包括的历史与现状，举凡建置沿革、地理位置、地质地貌、水系物产、气候与自然灾害、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村政建设、解放前的土地关系、租赁关系、历次重大政治运动

中的情况，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变化，集体、个体、企业的蓬勃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婚姻制度、血缘家庭、财产继承、亲属称谓、物质民俗、人生礼仪、节庆习俗、乡土娱乐，以及村落祖灵信仰、宗教信仰、风水信仰与各种禁忌等等，一应俱全，条分缕析，都作了深刻的剖析与论述。尤其是章节前的导语，提纲挈领地概括了对所述事象的基本认识与观点，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这样，透过对一个村落的剖析与观察，便可以把东山客家方言区的基本概况尽收眼底。文末还附有几个颇具特点的个案，这些都是研究客家文化的珍贵文献资料，其价值不菲。

当然，由于受个案类型与实际情况的限制，许多客家村落有的事象缺乏记述，或者过于简略；而书中某些事象的举证与归类是否得当、某些导语的概括是否准确、详略是否合适，可能还存在不足，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推敲。不过，《成都东山客家太平村》的整理出版，有助于加深对东山客家方言区历史与现状的了解，对推进东山客家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钟培全先生和冯敏女士的合作是地方文史前辈人才、退休基层干部与学术研究机构专家携手推动学术研究的典范；盼望它成为四川客家研究再上一个台阶的良好开端。我们乐见往后在四川全省客家人聚居的地区，有更多像钟先生一样的有心人，把他们有关客家人文事象的亲历和见证如实记录下来，那对保存客家原始材料和文献积累将会是功德无量；于客家学的发展也肯定造益无尽。

最后，值得提到的是，这批成果被列为四川客家研究中心的集体科研项目，成书时虽然是以个人署名的方式体现出来，但在其成书的背后，却包含了众人的心血。例如，在前一本书（《成都沙河客家的变迁》）的调查过程中，我们邀请了成都知名水利专家、本地客家文化前辈学者撰写



序

专稿，与此同时还邀请高等院校师生、当地政府部门干部参与其中，携手开展课题研究。四川大学新闻与文化学院民俗专业的研究生，利用暑假社会实习的机会，冒着酷暑，走村串户，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取得了可喜的收获。成都市成华区文化广播电视局长期以来热心辖区内客家文化的宣传与应用，多次参与四川客家研究中心组织的会议与活动。这次作为本书主持编撰单位之一，又派员参与第一线的调查研究，协助解决调查中的相关实际问题。在《成都东山客家太平村》调查过程中，十陵镇政府（今更名为龙泉驿区人民政府十陵街道办事处）与太平村给予了积极的配合与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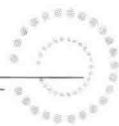
在本批成果问世之际，除向政府有关部门、单位和社会对我们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的同时，我们也希望今后大家都来关注四川客家文化的研究，让我们携起手来，为繁荣和发展社会科学，为破解成都东山客家方言区存在之谜而共同努力吧！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刘义章

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陈世松

2005年7月7日

引 言



成都的近郊有一条古老的沙河，从西北的洞子口往东再折向东南，经驷马桥、五桂桥到河心村，滔滔滚滚的绿波流入府河；它像一张强劲的弓在东面环护着府城。这二十余公里的沙河地域曾是天府之国景观的象征：两岸是肥沃的自成灌溉系统的平畴良田，附郭一带更是中国罕有的黑油沙土，出产鲜美的蔬菜。在沙河上有许多桥梁，使府城保持着与农村的联系；许多架高大的筒车和隆隆的水碾在不停地转动，展示着一种生命的活力；还有许多勤劳的人们在两岸世代耕种和繁衍生息。沙河静静地流了两千多年，虽然免不了沧海桑田，但它的位置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变化。中国社会进入 20 世纪 50 年代，经济发展迅猛，人们生活节奏加快，都市不断向周围的郊区扩展；所以在新的世纪我们再到沙河时，这里已是现代化的成都市区的一部分：高楼洋房代替了竹篱茅舍，商业大道改换了泥路田坎，朴质的农夫转变为城市居民。2001 年 11 月 28 日成都市沙河综合整治工程的宏伟计划开始实施，沙河的旧貌改观，将使这古老的河流接受现代都市文明而焕发青春。在



引
言

成都的地方文献里并未忘记沙河，但作为整体的沙河文化都缺乏应有的关注。我们可以预期，当综合整治工程竣工之后，沙河的一些民间故事，传统风俗，俚小地名，农耕文化，创业历史，乡间旧闻，等等，都将被新的文明掩盖而消失得无影无踪。历史上不少的地方文化都悄悄地流逝了，似乎这里从来没有人们生存与奋斗的脚步。当沙河综合整治工程全面而迅速进行之际，我们不应忘记：这里曾有许多客家人曾创造过一种客家文化。

在成都的居民大都知道或偶尔听到过与通行的西南官话相异的一种声调与词汇奇怪的土话，根本无法听懂的。成都人称之为“土广东话”，因说这种话的自称是“广东人”，自称所说的是“广东话”。成都人为了将他们与操粤语的广东人相区别，所以称他们为“土广东”。成都的“土广东”的确是在清代初年移民过程中大都从粤东北山区来的。广东人称粤东北山区操土话的人们为客家人。客家人的方言自成体系，它是汉族古老语言的遗存，属于中国汉族八大方言之一。操客家方言的人在近代由闽粤赣等祖地分迁于中国东南、四川、南洋群岛、台湾、香港及世界各地。他们顽固地保持着祖宗的传统和祖宗的语言，而且以中原汉族的正统自居，具有坚毅、勤俭、执著、开拓、适应的古老汉民族精神。中国历史上中原衣冠士族曾三次大规模的南迁。第一次是公元317年，西晋为前赵所灭，皇室琅玕王司马睿渡过长江到建康（江苏南京）即帝位，为元帝，重建政权，保有江南半壁河山，史称东晋。当时中国北方正是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个民族互相争夺政权的战乱年代，汉族的名门望族及普通民众纷纷随着晋王室迁移到江南。第二次是公元875年，即唐僖宗乾符二年，年初农民战争爆发，王仙芝、尚让等在长垣（河南

长垣东北)起义;五月黄巢起义。乾符五年(878)王仙芝在黄梅(湖北黄梅西北)战死,部众推黄巢为王,号冲天大将军。广明元年底起义军突破潼关,攻入京都长安(陕西西安),次年十二月黄巢于含元殿即位,国号大齐。中和四年(884)黄巢在虎狼谷(山东莱芜西南)兵败自杀。在历时九年的战乱中,中原士族和民众再次大规模地南迁。第三次是公元1127年,北宋靖康二年,北方的金兵攻入北宋京都开封(河南开封),俘虏宋徽宗和钦宗父子,押解北上,北宋灭亡。五月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河南商丘)即位,改元建炎。建炎三年(1129)以临安(浙江杭州)为都城,史称南宋。中原士族和民众随着宋室南渡。经过三次的大迁移,原来的中原士族在江南定居下来,宗族繁衍兴旺,促进了江南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客家人的许多家族是与这三次南迁有关的;然而即使在南宋时期,客家尚未从汉族中分离出来,即是说这时客家还未形成一个民系。客家是形成于特定的地域,这就是与福建西部和江西南部接壤的粤东北山区,而时间是在南宋末年汉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灾难之时。



引
言

公元13世纪之初,北方蒙古族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强大起来。1227年蒙古军灭亡西夏,1233年蒙古与宋王朝联军灭亡金国;次年宋王朝出兵收复中原故地,但被蒙古军击败。自1258年起,蒙古军分三路进攻南宋。南宋咸淳十年(1274)昏庸的度宗皇帝死去,四岁的儿子赵昀奉遗诏于灵柩前即皇帝位。德祐二年(1276)正月蒙古大军逼近京都临安,赵昀派遣监察御史杨应奎向元蒙军送上传国玉玺,奉表称降。宋朝丞相陈宜中等拥立度宗的庶子赵昀为端宗,即位于福建福州;文天祥受命为右丞相枢密使,十一月聚集宋军余部入汀州(福建长汀)。景炎二年(1277)

正月，元蒙军逼近汀州，文天祥因兵力不足，率宋军移驻漳州龙岩（福建宁化），与宋军残部会师。二月文天祥收复广东梅州，建立督府，整顿并训练新军，不久由梅州出发，翻越五岭，收复江西失地。文天祥在江西与元蒙大军转战，于永丰空坑大败，宋军被冲散。元蒙军在空坑未捉住文天祥，遂调动大军往福建消灭最后的宋王室。文天祥为了摆脱元蒙军的追击，率宋军向广东转移，到达粤东北循州的龙川一带山区，部队在此过冬。这时端宗赵昰在大臣陈宜中与张世杰的持护下，由福建的福安入海，到达泉州，继又乘海船靠泊于惠州海边。景炎三年（1278）三月文天祥向惠州海丰县进军，活动于潮州和惠州之间，寻找端宗皇帝。元蒙军都元帅张弘范率领水军、步兵和骑兵从福建南部转向粤东北，穷追宋军。十二月文天祥于海丰西北的五坡岭为元蒙军俘获，宋军官兵殉难者不计其数。祥兴二年（1279）张弘范率元蒙大军至广东新会海中的厓山，与张世杰等宋军进行海战，一时风雨骤至，浓雾漫天，宋军大败。宋臣陆秀夫见大势已去，背负幼主赵昺投入海中。杨太后见宋室最后一脉已绝，也投海而亡。张世杰及诸臣、宫女相继投海殉国。七天之后，海上飘浮的尸身达十余万人。南宋的灭亡，意味着一个汉民族国家的覆灭，汉族人民不愿屈辱于元蒙统治，宋军溃散的兵士、南宋衣冠士族及民众，经历浩劫而幸存者，有的逃避到了粤东北的山区。这些忠义的汉族人民在此与世隔绝，保存着汉民族的语言、风俗和传统文化，若干年之后竟成为汉族的一支较为特殊的民系了。东晋文学家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记述了古代战国末年一些家族因避秦国战乱，到了桃花源耕种自给，遂与世隔绝，成为一个远离时代和社会的社区。桃花源是风景优美，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之地，而粤东北山区是不

能与之相比的；但这支汉族民系却在非常艰苦的自然条件下生存和发展了。他们以耕读传家，教育子弟读书务农，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同时练习武术。妇女们最初是缠脚的，经历了国破家亡之后，取消了这种不健康的习俗，以便于劳动。她们从事放牧、樵渔、种地、织布，善于勤俭持家。这里的人们讲究仁义礼让的美德，儒家的文化传统继承下来了。在清代中期，这支汉族民系人丁兴旺，不断扩大，于是逐渐向惠州府的博罗、增城和广州等地发展。他们与操粤语的土著居民为了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的争夺而时常发生冲突，甚至引起大规模的械斗。土著居民称这些山区的汉族民众为客家人，并有歧视之意。所以“客家”这个词语的出现是较迟的。

客家人从来没有忘记宋末元初祖先避难入粤的历史。客家人的入粤始祖一般是从江西赣州出发，沿着赣江而上，东行经瑞金、隘岭，从武夷山的一个通道进入福建汀州府的宁化，折向闽西而到粤东北的；如此迂曲的路线是为了避开险恶的崇山峻岭。福建宁化位于闽西武夷山东麓，是闽江、汀江和赣江的源头，东临明溪和清流县，南接长汀，西毗江西古城和广昌，北界建宁县。宁化的石壁村是客家祖先入粤东北的中转之地，曾有百余客家姓氏家族从此经过，因而现在被誉为客家祖地。客家人的家乡是蛮烟瘴雨、穷山恶水之地，此方圆三百余公里的粤东北在古代是交通闭塞的深丘陵区，东有武夷山，北有五岭，西有大夷岭，南有南岭，土旷人稀，自然条件很差，原本是畲族先民聚居之处。自宋代以来此地的政区时有变化。《宋史》卷九十《地理志》记载：韶州所辖的县有曲江、翁源、乐昌、仁化、建福；循州所辖的县有龙川、兴宁、长乐；梅州所辖仅有程乡一县。成都东山的客家人主要来自宋代的循州。



引
言